

定鼎中原之路

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姚念慈 著



定鼎中原之路

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姚念慈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 姚念慈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ISBN 978-7-108-06281-9

I. ①定… II. ①姚…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 D6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7746 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 数 322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7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姚念慈，湖北武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师从王鍾翰先生研习清史满族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著作有《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清初政治史探微》《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定鼎中原之路》，论文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等。

藏 诸 名 山

传 之 其 人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姚念慈 著

◎ 定鼎中原之路

——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姚念慈 著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韩 琦 著

中国史学史の考析与评判

乔治忠 著

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

刘永华 著

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

范兆飞 主编

重新发现中亚

斯坦因 弗兰克 塞诺等 著 袁剑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

目 录

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 1

——代序

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 15

——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

- 一 皇太极兴师“伐明”质疑 16
 - (一) 初衷攻明？还是察哈尔？ 16
 - (二) 苏布地与皇太极关系之疑点 21
 - (三) 皇太极入关后苏布地之表现 26
 - (四) 入关伐明是否符合皇太极本意 31
- 二 明廷的失策——放弃抚赏朵颜三卫 34
 - (一) 蒙古形势变化与抚御之分歧 34
 - (二) 进取辽西与抚赏蒙古 40
 - (三) 启禎之际抚赏之议 44
 - (四) 崇禎举棋不定与本末倒置 48
 - (五) 袁崇焕为苏布地“储粮”辨 55
- 三 金军顺利破关与蓟镇防御再检讨 61
 - (一) 蓟镇三协分布失当 61
 - (二) 蓟辽总督驻所东移与总督暂缺 65
 - (三) 金军破关与蓟镇中东两协 73

四	明金两军蓟门对峙与至京时间	76
	（一）袁崇焕“遣散援军”原委	76
	（二）自通州入卫京师	85
五	北京城下三战	91
	（一）德胜门之战	91
	（二）广渠门之战	96
	（三）左安门对峙	99
六	形势转折点——袁崇焕入狱	103
	（一）再说皇太极反间计	103
	（二）关宁兵东溃与重整	113
七	皇太极大军北返之再考察	120
	（一）永定门之战与撤离北京	120
	（二）东进山海关受阻及《老档》《清实录》之失载	127
	（三）击败西线明军、仓皇出关	136
	结语：皇太极如何看待入关得失	142

多尔袞与皇权政治 151

一	根基脆弱的崇德皇权	151
二	统治集团的矛盾与福临继位的实质	158
	（一）八旗与崇德皇权之渊源	158
	（二）“八王共治”之余绪	164
三	多尔袞与两黄旗的合作	167
	（一）二王摄政出笼之经过	167
	（二）豪格的异动与多尔袞独揽大权	173
四	清军入关与皇权政治的演变	183
	（一）崇德政治遗轨	183
	（二）清初专制皇权之根源	187
五	“皇父摄政王”与皇权的归一	192

(一) 多尔袞篡夺皇位之步骤	192
(二) 未行篡位是否因两黄旗大臣抵制	197
(三) 太后“核心”说质疑与“皇父摄政王”之内涵	203
(四) 多尔袞生前“归政”说难以成立	209
(五) 专制皇权之下八旗关系的变化趋向	219
结语	224

评清世祖遗诏 225

一 遗诏与罪己诏的诠释	226
(一) 遗诏的实质及世祖背离满洲的时间断限	226
(二) 顺治十七年平反旧案之含义	232
(三) 世祖坚持汉化改革的现实根源	239
二 八旗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国家机构的影响	247
(一) 上三旗的组建过程及时间	247
(二) 世祖亲政初期的所谓“率由旧典”	252
(三) 专制皇权及满洲君臣的疏离	257
(四) 满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组	263
(五) 议政会议的权限及与皇权的关系	272
三 从内三院到内阁——行政中枢的建立	289
(一) 徒有其名的文职衙门领袖	289
(二) 亲政初年内院人事更替	296
(三) 顺治十年票拟制度的改革	301
(四) 学士批红	307
(五) 世祖与汉大学士的冲突及陈名夏死因	311
(六) 南北党论质疑	322
(七) 内三院更名内阁的历史背景	334
赘言	353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356
一 玄烨计擒鳌拜之原因	356
二 四大臣辅政之由来及其位序问题	361
三 辅政体制与所谓亲王贝勒监临	368
四 辅臣“公同奏事”和“太后裁决”辨析	378
赞言	386

主要参考文献	388
--------	-----

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

——代序

令我惭愧的是，本书只有第一篇《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是新写的，其余三篇《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都是多年前的旧作、明日黄花，设非责编先生诚恳鼓励，我是绝没有勇气拿出来的。

明清嬗替的历史过程曲折而漫长，故使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后的几位满洲统治者皆带有开国之君的特征，清代庙号于太祖、太宗、成宗之下，复有世、圣二祖，昭彰史册，绝无仅有。只是我学力微薄，一向不敢写“全传”。四篇文章写作的间隔很长，视角和问题也不尽相同。好在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和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都可视作满族入主中原的重要片段，撮合到一起，取名《定鼎中原之路》，或也差强人意。

我本无改写旧作习惯，三篇旧作且带有与前辈学者和时贤商量的味道，以现在的认识水平来作修改，于对方显然不公正也不尊重。当初落笔，只求彼此会意即可，故不多交代过程，注意的是文章气贯，致使段落过长，不熟悉背景和缺乏耐心的读者难免生累。后来收入《清初政治史探微》作过些微调整。此次结集，对一些长段子分得更细，添加小标题。史料校对中发现的问题，一并改正。

重温旧作，难免感慨。1989年，我年至四十方投入王锺翰师门下改习清史，真正是半路出家。三年后以《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完成博士论文，对清入关前八旗制国家的形成和本质特征以及汗权

（皇权）与八旗的关系演变作了初步清理。错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思维方式基本定型，难有大的变化。我没有钟翰师的眼界和语言能力，虽然对国外清史研究中的新史观、新思维有所关注，实际上做起来，大体还是遵循钟翰师教导的实证路数。

近代实证史学不同于古代中国名物制度考证，而逐渐发展为对重大事件的辨析，以至于对某段历史趋势的概括，具有史论和解释史学的味道，思辨色彩也越来越浓，可以说是思辨指导下的实证，但其基本特征仍然是依据文献史料来确证事实。从此立场而言，政治史研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领域。若文献不足征，就得望而却步，许多问题始终是一个谜，在我们对历史连贯性的理解中留下大大小小的空洞。我以为，最明智的态度是承认实证史学的这种缺憾，不必在具体问题上强作解释，所能稍作弥补的，只是以可用史料确认的某些重大关节点为基础，前瞻后顾，确定一段历史的特征和趋向，并以此来推断其间那些无法证实的事件可能具有的含义。这无疑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却也是政治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三篇旧作从个案入手讨论清初政局演变。历史上的疑案或具体的事件其价值如何，在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不可一概而论。同样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价值亦迥异。价值判断的前提是确认事实，后者必须建立在史料的鉴别和分析之上，即属于实证。清代历史上的许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与统治者利害攸关，其原始过程和直接证据被当时的记录者或后来的编纂者有意湮灭。若能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往往也是破解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关键。

政治史若仅从所谓大势着眼，回避个案，无视具体史实，历史叙事就很容易落空，变成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政治制度演变的内涵也无法得到显示，而且极有可能发生误解。这实际上是研究乏力的表现。比如说明清嬗代，如果我们不了解其复杂过程，而仅获知明朝失败和清朝胜利，那和朱子所说的“看人相打”有什么两样？或

者跟着胜利者说本朝如何英明、失败者如何腐朽，那岂非一部成王败寇史，如何启迪后人？又如明清两代都设立内阁，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清承明制”，那么，何以明朝皇帝饱受臣下訾议，而清朝皇帝则绝对不容置疑，其间的差异如何解释？同样是皇太子的立废，康熙皇帝视若儿戏，阁臣绝不与闻；而万历皇帝则唯恐群臣怀疑其有私意，苦苦乞援于大学士出来担当，两者大异其趣。其中的原因虽可以继续探讨，而明后期兴起的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呼声因清朝定鼎而中绝，则是可以由实证确定的基本背景。明后期士大夫党争对朝局有极大的影响，但能否左右皇权，则又另当别论。某位海外明史权威认为，万历皇帝进行“浑河之役”（即“萨尔浒之战”）是迫于党争的压力。其实，当时“朝政日壅，人情久郁，大僚半缺，言路几空”，明廷的危机并不在党争，而是君臣决裂，大举征剿纯属万历皇帝宸衷独断。此种误会，即因对史实缺乏切实的观察。再如，康熙皇帝祭拜明孝陵，亲题碑文“治隆唐宋”，本意是极力推崇明代。国内有学者见“唐宋”以下缺一“元”字，便断言玄烨认为明朝代表中原王朝体系的延续，而以其本朝大清属于辽金元另一系统。倘若对清前期诸帝如何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是明朝的继承者稍有了解，大约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

由是可见，即使一个具体判断，也需要对大的历史脉络成竹在胸。个案研究若缺乏宏观的历史视野，其意义很难得到完全的展示。而历史宏观理解的形成，又有赖于具体个案的深入和积累。叔本华说：“整个思想通过各个部分而显明。而不预先理解全部，也不能了解任何最细微的部分。”这大概是对整体与局部关系最好的说明。然而史学却不能像哲学那样预先构造一个先验的总体概念，史学的宏观只能得自大量“经验”的积累，即具体史实的综合概括，而史实的准确把握又只能来自实证。我们将清初旧案重提，当然不全是满足趣味性追求，而是通过吸收、借鉴以求改进前辈学者已有的考证成果，在一定的视域之内，力图以这些具体事实来深入解释清初政

治的演变，故不仅要细致分析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且必须以朝廷中的满汉关系以及全国抗清形势作为大背景，这自然对实证史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多尔衮与皇权政治》发表于1996年，是我博士论文的延续，视野也由关外时期进入中原。以往多尔衮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传说中的孝庄“太后下嫁”，而“太后下嫁”又起因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清史泰斗孟森先生《太后下嫁考实》一文认为，既无太后下嫁诏书，故下嫁之说即不可信；太后既未下嫁，则多尔衮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皇父，故将“皇父摄政王”拟之如中国古代的“尚父”“仲父”。质言之，福临与多尔衮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并无父子关系。多尔衮虽有“皇父摄政王”之称，仍只相当于臣。孟森考史，基本原则是“证”无有即“事”无有，虽然严谨，却不无武断之嫌。殊不知历史上的无证之事指不胜屈，焉能事事有证？孟森所著《明元清系通纪》一书于明清史有开创之功，而“皇父”的误释，却又表明对满族传统缺乏了解。故胡适读罢孟文，致信孟森明确表示心有未厌，孟森也未作进一步申说。

继孟森之后，郑天挺先生推出《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宗旨一遵孟森，唯考证更为详密。其结论是“皇父摄政王之一切体制均下于皇帝，与太上皇固不同也”。而“皇父摄政王既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绝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然而“满洲旧俗”并无称“皇父”者，唯努尔哈赤曾称为“父汗”，满语为“阿玛汗”。“皇父”满语为“汗依阿玛”，与“阿玛汗”虽有一间之隔，但已甚为接近。而清初国史院满文档案，乃有径称“皇父摄政王”为“父王”者，且非只一见，几与“父汗”无异，最符合多尔衮凌驾福临之上的意图。实则多尔衮欲改称“皇父摄政王”最好的注脚，就在《清世祖实录》中：一则曰“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为储

位”；一则“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此岂“左右之希旨阿谀”推为“最高爵秩”所能解释？

锺翰师《释汗依阿玛》一文问世，已晚至数十年之后。针对孟、郑二人的“尚父”“酬德报功”说，锺翰师分析“皇父摄政王”的满文结构，指出“皇父”“摄政王”两个主词各有所指，而前者并非来自后者，意即“皇父摄政王”不是一个逐渐提升的爵位。并据当时档案臣工疏奏皆将“皇父摄政王”较“皇上”抬写一格，揭示出多尔袞实已高居于福临之上。这是锺翰师胜于孟、郑之处。可是锺翰师的思路也因此出现一个跨越，即认为“皇父摄政王”既高于福临，故太后下嫁则为可信；且推断“多尔袞受封皇父之日，即是太后下嫁摄政王之时”。而其理由，仅据满洲婚姻有不遵行辈的习俗和南方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尤其是轻信“太后下嫁诏书”曾于清末民初惊鸿一见的传言，又成为许增重先生《太后下嫁说新探》一文诘难的起点。

许先生的最大贡献，即从史源学上对太后下嫁说进行全面清理，其中揭露所谓“太后下嫁诏书”曾经流传于世的种种疑点，实为锺翰师而发。许文的另一贡献，即将太后下嫁、多尔袞称“皇父摄政王”之事置于当时的政治角逐中来分析。其中贯穿一条主线：多尔袞称“皇父摄政王”，目的是篡位；而史实表明，多尔袞又终未篡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遭到两黄旗大臣的抵制，而两黄旗背后的支柱或核心就是太后；太后若果真下嫁多尔袞，即不啻投降，必使两黄旗分崩离析，更无从阻击多尔袞篡位；欲保住福临的皇位，太后势不能下嫁。故其最后的结论是，多尔袞最后选择了放弃篡位而归政于福临。许文逻辑严密，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我初读许文，深为其论述的精彩、识断的高明所折服，似无懈可击。静而细思之，其论证的许多依据又与我所体会的史实相违戾，引起我的困惑：首先，两黄旗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在多尔袞擅称“皇父”之前，两黄旗大臣大多投靠多尔袞，而对抗多尔袞之少数中

坚，图赖早死，索尼被发遣关外，剩下鳌拜已无所作为。其次，许先生构想太后为两黄旗的核心，且在宫中形成一个与多尔衮相抗衡的集团。而太后之所以成为核心，是以福临继位得力于太后为先导，又以多尔衮最后准备还政于福临，甚至是以顺康之际太后设计四大臣辅政为后援的。但前两者均无明确史料，只是推断的结果；后者即或成立，也并不等于能证明前两者一定成立。因为清军入关前后，形势可谓天翻地覆，多尔衮摄政期间与福临亲政十年之后政治结构已发生了极大变化。至于许先生提出的多尔衮还政于福临一说，又是以其终未废黜福临而自称皇帝为根据的，其前提显然是遵循孟、郑所认定的“皇父摄政王”地位不如皇帝。然若如鍾翰师所证明的“皇父摄政王”已高于皇帝，其所欠者仅仅是皇位世袭，则对于并无子嗣的多尔衮是否有此必要？这又涉及对“皇父摄政王”含义的进一步理解。我为此久久纠结于胸，焦虑不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头诉诸史实，苦思一年有余，方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一文。

检讨先行者们的研究，我愈益相信历史研究必须严格地以史实为根据，万一无从获得史料证据，不得已而需要推断，如前所说，也只能在某些已经史料确定的、无可动摇的基点之间稍作弥补。而一旦越出这些基点，无论其逻辑多么缜密，都是危险的，甚至导向完全错误的结论。历史运动是复杂的，充满变数，不见得都有逻辑可循。破解历史中的疑案，在史料纷繁、互相抵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某种灵感。灵感一来，很容易令人喜不自胜。但我们必须牢记，获得一个思路，只是提供了一条途径，是否能沿此走到底，则须戒慎恐惧，履薄临深。研究过程中经常是进一步柳暗花明，再进一步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甚至是悬崖绝壁。不另辟蹊径，很可能身陷谷底，越是自圆其说反而越不能自拔，毋宁暂时搁置为好。研究既然是探索，就有风险，若是指望每一点思考都能体现出成果，则未免夸大了研究者的主观意识，终将力不从心。明清史料浩如烟海，层出不穷，个人所及极其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在自信之中又有一

种不自信，以平和的态度来等待新说。用何龄修先生警告我的话来说，就是“要随时准备被驳倒”。

如果说《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是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争论，以确认入关前后清初皇权的本质变化，《评清世祖遗诏》则是对《遗诏》方向性的理解进行辩诘。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本旨在考证福临溺佛，欲遁世出家，就此而言，可谓凿凿有据。陈垣先生悟性独高，甚至窥测出世祖实已剃发，与孟森相得益彰。孟文论《遗诏》公布，经太后、诸王更定，非福临之本意，大致可以成立。然而奇怪的是，福临的溺佛、纵情、奢靡、任用宦官，却成为孟森理解《遗诏》的出发点。太后之所以用《遗诏》深责福临，旨在剔除福临生前的乱政，使清代政治恢复正常轨道，故其言：“就遗诏全文观之，未必世祖能彻底悔悟至此。而既有此遗诏，则清祚之所以灵长，太后、诸王之所以能为宗社计也。”又以福临死后清廷清除宦官为补证，以此“实为清一代最惩覆辙之高见”，“为清永抑宦官之始”。

我读《世祖遗诏》，第一感受是惊讶其对世祖从施政方针至个人品性行事否定无遗，其措辞之严厉，为历代遗诏所少见。而其要害，却并非如孟森所言，在世祖“溺佛纵奄，两擅其胜”，而在于世祖疏离满洲亲贵而亲近汉人，故《遗诏》视世祖为本族之叛逆。不难看出，《遗诏》的基点是急于中止世祖的汉化，并为四大臣辅政规定大政方向。在太后“安排”四大臣辅政的八年中，康熙皇帝竟然未曾拜谒世祖陵墓，亦足见太后与满洲权贵集团对世祖的态度。孟先生见不及此，使我难以服膺其论断。其次，《遗诏》针对谁而发？孟森说：“当时汉族新服，满族方张，柄国者所惮在满不在汉。”即是说，《遗诏》是为解决满洲内部的威胁，而满洲内部之威胁，又莫过于宗室诸王。孟文引征《清实录》，以《遗诏》颁布之前，先呈太后，而后出示诸王贝勒，即认为《遗诏》经太后、诸王共同改定，已颇含糊。随后又以太后命四大臣辅政，四臣以为无此先例，故跪请宗王，迨宗王表示辞让，方就其任。此不过一形式而已，而孟森则断言《遗诏》之

所忌惮者在宗室诸王。果如孟森所说，则必以限制宗室诸王为目的，然而《遗诏》却处处为其不平。这里孟森的思路出现矛盾混乱。其实，令太后和四辅臣不安的不是宗室诸王，而是世祖的政治倾向。正是世祖亲信任用汉人，逐渐剥夺满洲亲贵对政权的垄断，故令《遗诏》的制作者深致不满，决心立即扭转这一危险的趋势。而四大臣辅政期间，多倒行逆施，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即因沿袭关外遗轨。

孟森之所以有上述误判，以我的揣度，原因有二：其一，众所周知，孟森的清史研究目的之一，即在于纠正清末民初以来反满浪潮中所挟带的偏见，力主清代为中国正统王朝，可谓居功至伟。但孟森于纠偏之中又不自觉对清初弊政多所回护，其《清史讲义》中即有明显表露。而此处“汉族新服”一语，无意中显露出其低估了清初尖锐的满汉矛盾，显然没有认识到顺治一朝在皇权确立绝对权威之后满汉联合统治之迟迟不能实现，即在于受到明末农民军联合南明政权抗清这一总体形势的制约，更未能认识到康熙朝爆发的“三藩之乱”迁延八年之久，同样是满洲统治者实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的产物。简言之，孟森对满族定鼎中原这段历史的宏观理解中，忽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满汉两个民族仍处于对抗状态。清世祖福临之所以远胜于满洲亲贵，即因其察觉出民族对抗对满族和大清政权的危害，故欲在保证满洲统治地位的同时尽量缓和朝廷中的满汉分歧，在制度上承袭明朝，以建立满汉联合统治，但却被目光短浅、固守征服传统的满洲亲贵视为莫大危险。在这一点上，太后、四辅臣和宗室诸王贝勒并无分歧。

其二，孟森高估了太后在清初历史上的作用，此于清史界影响颇为深远。而检诸《清实录》，福临即位之际，太后渺然无所闻。太后主持政局，唯有福临死后安排四大臣辅政一事。玄烨八岁继位，甚为偶然，因世祖死于天花，而玄烨已出痘具有了免疫力。顺康两朝授受之际，太后之能作为皇权的最高权源，选择玄烨即位，而不需如议立福临时八旗诸王贝勒共议，原因皆在于入关之后皇权具有